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 “到世界去”与“中国立场”

## ——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海外传播与公共性建构

周银银

**摘要:** 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跨域传播中,书写当代中国现实的小说因其独特的“配方和新酷”迅速“出圈”。这种跨文化传播不仅增强了文化自信,还在空间拓展中促使文学公共性激增,让它们以“中国在场”的姿态成为世界文学共同体中的创造性力量。此类文学能异军突起,首先得益于故事的中国性、当代性及现实性,其次,则离不开叙事上“民族性色彩+国际化表达”的熔铸。除了收获荣光,它们的“扬帆出海”也引起了浩波巨澜,向西方谄媚、奇观展览、图解现实、脱离生活等“恶声”不绝于耳,域外口碑爆棚之下其公共性图景的虚实亟待辨析。回归文学本体,无论传播效果面临哪些制约,强化我们的文学建设都是立足之本。文艺“尖兵”们既要回到“民族的天空”,坚守“在地性”的本土经验,也要以“国际视野”为参照,提炼出具有“世界性通感”的议题,并在“民族底色”与“国际技法”的双重变奏中完成叙事革新。如此,不仅可以捍卫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边界”,还能在“接受世界、不忘传统、立足当代、融入世界”的旅途中走向“无疆”的世界,并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对话中构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公共空间。

**关键词:** 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文学传播;文学公共性

当前,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浪潮中,中国文化和文学日益受到重视。其中,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毕飞宇、格非、苏童、范小青、铁凝、迟子建、韩少功、李锐、徐则臣等作家介入当代中国现实的小说因其独特的“配方”和“新酷”更容易漂洋过海,在异域他乡开花结果。在“跨国旅行”的征程中,它们的辐射域不断扩大,于世界文学境域中获得了更多平等的“文学性对话”契机,也在动态传播和思想碰撞中孕育了

“生成性对话”模式。同时,经由文本建构的公共空间、作为文化事件形成的社会公域以及传播积聚的公共话语,这些作品收获了显著的文学公共性,使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以“中国在场”的姿态成为世界文学共同体中的重要角色和创造性力量。

当然,走向“世界”或置身于“世界”风景中,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抢占山头或炫耀成果,而是希望借助与异域文学的对话来重估当下现实

主义文学的价值,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有益的“吸氧”与内化中,我们也期待中国文学既葆有介入的思想利刃,又能冲出叙事的“窄门”,去时代潮汐中闯荡,从而实现文学更新、增强文化自信,走向文化他信、互信和共信,建构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 一、从“单行道”到“双行道”的流动：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域外传播 与接受的历史演进

当前,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在异国他乡的译介、传播与接受似乎呈现出杂树生花的繁荣格局。其实,从“无声的中国”到“有声的中国”,这一过程可谓曲折回旋。那么,面对跨国别、跨文化、跨语际、跨族群的环境,回溯“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以及现实题材的文学,它们究竟构成了怎样的传播史与接受史呢?基于域内之力和域外之力相互冲突又彼此融合的特征,中国文学在传播中如何实现从文明龃龉到文化互通的转化,怎样从异质性力量中寻求协同性力量,是否建构起互证、互补、互识的双边对话关系,何以更好地传播中国形象?

从百年中国文学切实的传播史来看,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西方文学搭乘着启蒙、科学、民主的快车道蜂拥而至。我们自己的文学在文化碰撞中虽然经历了更新换代,但尚未能解锁传播理念、传播场域、传播机制、传播渠道等的有效方式,其域外传播步履维艰。就现实题材的小说而言,此时在“为人生”的艺术导向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执牛耳的语境下,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现实主义文学率先崛起。但是,导因于强烈的傲慢与偏见,“没什么值得译的”,鲜有作品能扬帆出海,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坛仍处于湮没无闻之态,正如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sup>①</sup>其后,伴随着“启蒙”与“救亡”之声的交替进行,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应运而生,现实主义文学在革命的硝烟中野蛮生长,但是由于传播通道的逼仄,无法

改变在“世界”中所患的“失语症”。1949年以后,伴随着一幅幅宏伟的革命蓝图,中国文学改头换面,其文学传播也开启了新征程。此时,导因于政治话语的规约,中国文学迈向了“共名”时代,作家们在政治激情的主导下只能扮演时代的“记录员”角色。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等关注现实的文学在短暂的“百花齐放”后便进入了“风霜并行”的凋零期,经由各种社会主义的变奏与高歌,其标榜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发生也发生了走样。站到“世界”维度来看,此时国际形势正处于冷战时局,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依靠《中国文学》这样的官方刊物来坚持定向译介和中国政府有目的的“送出去”,但总体属于传播沉寂期,外国文学向我国的“输入”规模远胜于我们的“输出”。至于当时关注现实的文学,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传播形势喜人,苏联、捷克、波兰等国家热衷于翻译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当然,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文学的传播也进入冰封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解冻和改革大潮,中外文学交流随之复苏,“西学热”开始出现。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如百舸争流般奔涌而入,其“离经叛道”的探索姿态给元气大伤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强心剂”,也让“归来”作家和迷惘的年轻一代们呼吸着新鲜的文坛空气。在“革命”“打破”“新生”的号角下,他们奔走相告,开启对异域文学,尤其是西方大师的致敬与学步,发动了一场场喧哗躁动的“文学地震”。面对“世界文学”的诱惑,他们疯狂地“拿来”各种现代派的技巧和观念,希望借助异域的“声音”来“重返世界”,以打破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坛的至暗时刻。应该说,文坛悍将们以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为镜像的写作虽然不乏“食洋不化”的嫌疑,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原先的传播压力差,让“无声”的青年们在“破冰之旅”中显山露水。此时,中国作家也受邀到西方国家进行交流、讲学等活动,赴外交往固然

<sup>①</sup> [美]埃德加·斯诺:《编者序言》, [美]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文洁若译,第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让封闭许久的作家们产生了“震惊”体验,但也拉近了东西方文学之间的距离。至于关注现实生活的小说,如与时代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改革文学也破土而出。《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系列”《人生》《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鸡窝洼的人家》《浮躁》等小说应和着工业及农业改革的先声崛起,它们握住时代脉搏,见证改革时代农村的山乡巨变和城市的波澜壮阔,建构了生机勃勃的改革中国形象。这类文学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吸引了国外译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借助文学的社会学功能来了解改革时代的中国新貌。此时的传播通道既有我们借助《中国文学》“熊猫丛书”展开的“送”,也有国外他者主动的“拿”。在有拿有送的传播通道中,关切现实的中国文学开始了“跨国旅行”的征程。当然,中国文学在这一轮变革浪潮中虽然打造了流动的文学盛宴,但并不代表消除了走向世界的摩擦力。事实上,此时的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坛的雾霭并未散去,西方研究者或读者往往是凭借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而非文学性视角来估量中国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的壁垒尚未打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崛起、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大众传媒的勃兴,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无名”化时代,文学的域外“旅行”在“走出去”工程、中外联合翻译、民间与官方合作等路径中同样构成了多元化传播的版图,关注现实的文学及中国形象也受到了海外汉学家、研究者和读者的重视。当然,由于国内外历史文化、政治话语、国家价值观、语言翻译等的规约,中国文学在东亚和欧美文化圈之间扩大了区域性接受的不平衡。

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加速度”的奔跑时代,文学亦加快了抵达世界的步伐,并完善了传播模式、拓宽了传播版图。特别是伴随着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下“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学强音,我们告别了“到世界去”的单行道,进入“送”与“拿”双向互动的良性轨道。其中,莫言、余华、阎连科、毕飞宇、苏童、王安忆、王蒙、贾平凹、韩少功、残雪、刘震云、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被广泛翻译到英法美、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不同语言圈

和文化圈的国家,并屡摘桂冠,一次次掀起独具视点的跨域性公共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出圈”现象。客观而言,获奖并非衡量文学优劣的绝对标尺——其背后交织着译者的文化立场、出版机构的运作机制、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等多重力量的博弈。然而,中国作家频繁登顶世界文坛,至少昭示着一个事实:中国文学正在全球文学版图中提升能见度。尤其是2012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域外翻译家与汉学家加入翻译、推介中国文学的阵营,在读者、作者、译者、编者的合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也从边缘小众走向主流大众。此番“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跃迁不仅重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模式,也让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共同体中富有活力的“中国在场”。

其中,有一种传播景观值得关注:一批聚焦当下中国经验、直面时代命题的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在国际文坛频频“破圈”。它们呈现了“弄潮儿向涛头立”的当代性、介入性与时代感,当然也不乏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的批判性发言,比如《蛙》《生死疲劳》《黄雀记》《推拿》《兄弟》《受活》《第七天》《春尽江南》《我不是潘金莲》《秦腔》《黑暗地母的礼物》《炸裂志》《艾约堡秘史》《天黑得很慢》等。它们不仅被广泛译介,更在异域激发了持续的公共讨论,促进了文学公共性的建构。只是,“旅行”中催生的“文学公共性”究竟是基于文学本体的价值认同,还是源自其他有意无意的误读?在东方景观、作家立场、译者行为与域外接受的复杂纠缠中,我们如何廓清其真伪?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关乎对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海外传播价值的客观估量。

## 二、多元化的话语光谱：文学传播与文学公共性、公共空间的互动性阐释

在萨特口中的“时间壮观的流动”<sup>①</sup>中,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以“在场者”的姿态跻身世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文艺理论译丛》(2),第31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文学版图,并伴随着海外传播的过程积累了巨大的文学公共性。那么,此处,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性”以及衍生的概念进行厘定,揭示海外传播与文学公共性建构的互动性,从文本本体价值、译介话语转码、文学事件化的增值意义等维度索解异域公共性建构的途径。

在哲学领域,“公共性”一词可谓歧义丛生。阿伦特首先在《人的境况》中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性论证,她基于“公”与“私”的关系出发,强调人的“复数性”,提出公共性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毕竟,“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sup>①</sup>。随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福柯等学者也对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理性等概念进行了勘探,且经由社会演变、公众参与和理论革新而贡献了差异性阐释。其中,哈贝马斯是“公共性”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从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同源性出发,指出“公共性”的特点:公开性的展示、具有批判色彩和理性化(合理性)<sup>②</sup>。这番从公众参与、场域开放、政治批判、公共理性出发而提取的三种特征也为实现公共性提供了有效通道。尔后,不管“公共性”的概念发生了何种延伸,这三个特性已经达成共识。当然,哈贝马斯也一直致力于丰富“公共性”的内涵,到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他将公开性、批判性和理性化(合理性)调整为:从对话到交往、从批判到建构、从一元到多元。新世纪以后,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崛起,时至暮年的哈贝马斯重审公共性范畴,进一步扩展了公共性的疆域,提出了“跨国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同时也对数字时代下“公域”和“私域”界限的瓦解或曰“负责任”的守卫机制的消失表示担忧,并再次强调了数字公共领域需回归“交往理性”。<sup>③</sup>尽管哈贝马斯对“公共性”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阐释,但其总结的“公共性”特征并非无懈可击,其中,关于公共性的普遍化原则与多元主义、个体意志与公共意志能否共存以及如何共存的问题,他并未提供实质性的答案。事实上,只有在尊重“差异性”和探索“共在性”的基础上,方可在嘈嘈切切的公众意见和轰动的社会效应中形成一种理性、自律、实在的公共空间。

“公共性”是一个内涵驳杂的词汇,当它延

伸到文学与艺术领域时,文学公共性自然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学者们就文学公共性的传统与来源、文学公共性与作家行动的关联性、艺术的私人性与公共性、文学公共性的式微与重建、文学的公共性与公共空间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探究。那么,文学如何与公共生活对话,究竟何为“文学公共性”?南帆从文学能量的辐射域出发,认为文学公共性“表现为文学为公共领域提供何种视角,承担何种职责”<sup>④</sup>。陶东风从哈贝马斯界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的标准出发,赋予文学公共性以如下内涵:文学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理性的讨论、文学领域与权力领域的相对分离、对话空间共在性和差异性的统一。<sup>⑤</sup>李建军则从作家行动力和思想力的角度指出“所谓‘文学公共性’,无非是指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介入公共生活”<sup>⑥</sup>。不过,不管文学公共性的内涵在厘定上存在何种区隔,从文学的社会学效应层面来观照,学者们都认同文学公共性最终的功能在于“促进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生活的文明进步”<sup>⑦</sup>,其获得路径则与努斯鲍姆口中的“诗性正义”大同小异。

如果将目光拉回中国文学,导因于文学对政治的承重,我们同样需要厘清文学公共性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走过了哪番“活跃”或“式微”的旅程,这种曲折回环的轨迹如何对应政治文化环境的更迭、社会现实的易变、文学场域的转型与作家精神图谱的建构。比如在思想界拨乱反正的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作家主体精神的复归和个性之火的重燃,伤痕文学、反思

- 
- ①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② 杨东东:《公共性观念的价值——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的功能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 ③ 蓝江:《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 ④ 南帆:《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
  - ⑤ 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 ⑥⑦ 李建军:《“公共性”与中国文学经验》,《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文学、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这些作品既对创伤性历史进行了盘点,也直击了百废待兴的城乡改革现实,昭示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社会关怀。彼时的作家们同样担负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怀揣着显豁的公共关怀和悲悯精神,聚焦民族公务,关注百姓疾苦,“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sup>①</sup>。这些聚焦民族大历史和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也引起了广泛传播与读者群体的高度关注,指引他们参与到对民族事务的讨论中来,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公共性蓬勃生长。文学的黄金时代落幕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开始了文学“向内转”的浪潮,他们纷纷远离重大现实,削弱了与外界的关联,或退回“一个人”的书斋顾影自怜,或楔入历史的天空中遥想当年。当然,从公共领域遁入私人领域并不意味着作家漠视自己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历史回响,它们都或多或少与现实生活相挂钩,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沉静的文学公共性”<sup>②</sup>。然而,根据我们上文对“公共性”的理解,这种过度“提纯”的态势仍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负载的轻化与公共性的萎缩。新世纪以来,面对盘结错落的时代景观,作家们纷纷从遥远的历史甬道或私密的个人生活中撤退,加入社会现实的“合唱队”,积极书写这个时代的公共生活,宣告着文学公共性的重建。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媒介时代来临,公众也开始了全知全能的阅屏时代。文学活动自然逃不开媒介话语的干预,特别是一些新闻媒体记者利用媒介传播的特点顺势跻身文学公共生活。在消费意识的主导下,来势迅猛的新闻话语往往难以摆脱刻意诱导公众,甚至操纵社会认知的嫌疑。故而,在一片喧嚣声中,受众看似热情高涨,实则,它并非带着理性、自主、真诚色彩的交流,而是一种喊口号似的被强行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或曰“伪公共性”的猖獗,真正的社会问题常被屏蔽或歪曲,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sup>③</sup>因此,回到新世纪,让真正的文学公共性风景回归本位并非一朝一夕。

在对“公共性”这一语词追根溯源的基础

上,我们对文学公共性进行了阐释:首先,从创作者自身来看,作家作为时代的书记员,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识,关注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社会现实和民族公共事务,正所谓,“作家首先要与人民同行,才能谈责任感使命感”<sup>④</sup>;其次,从文学价值来看,作家们除了在日常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还要让文学“得风气之先”,即扮演“思想先锋”的角色,借助文学表达来形成公共议题,产生舆论交锋,建构公共生活。也即,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也需牢记知识分子的使命,怀揣着介入姿态、担当意识和怀疑精神,从公共关怀的向度出发,来传达“同时代人”对当下生活的凝视或展示个体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思考,张扬不虚美不隐恶的文学风骨,凸显真正的悲悯情怀和公共品质,让文学成为引领“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sup>⑤</sup>;最后,从社会学价值角度来看,当作家们经由诗意性与正义性共存的文学载体来呈现转型时代纷繁的景观时,一方面要正道直行,在独立思考中亮出个体的价值姿态,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文学这一载体的传播来走向大众,在与不同身份、群体、阶层的大众的互动中为他们提供再度思考社会公共议题的空间,编织起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共同体”<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当文学反映的问题与公众的个体经验产生颀颀时,作家们不能漠然置之,而是要从公众立场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维度出发,给予读者以启迪,在“介入”中“引导”大众再度反思我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境况与精神图谱,让他们在公共场合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由此,我们可以打造多元、宽容、平等的讨论场域,

① 路遥:《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路遥全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7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② 江涛:《喧嚣和沉静的冰火两重天——论新世纪中国公共领域与文学公共性》,《名作欣赏》2015年第16期。

③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第18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④ 张丽:《陈应松:作家首先要与人民同行,才能谈责任感使命感》,《人民政协报》2015年8月10日。

⑤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⑥ 张阔:《文学的独立性与公共性》,《上海文学》2008年第11期。

并让公众从被动静观到主动参与到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来,成为“明智的读者”。除了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文学还应在传播中为他们提供感受“他者”生活与情感的可能性,也即通过彰显公共色彩的文学让公众在“同情”与“畅想”机制中变得更具悲悯情怀,让他们在“痛”与“爱”中对苦难和拯救思考得更深刻,对当下现实中存在的阴影一面也越发警惕,对人性的“善”与“恶”理解得更通透。如此,才能形成一个更温情、理性、真实的公共群体,也能让文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阵阵跬音的回响中更有助于真正的文学公共性的建立。

由此可知,文学公共性建构需要文学传播的介入,缺乏有效的传播通道,文学的公共性将无从谈起。反之,文学公共性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公众需求以及公共讨论本身也驱动着文学传播活动,其实,文学传播的旨归之一即建设文学公共性。所以,两者之间相互塑造、彼此成全。回到现实主义小说中来,正因为文学与众不同的艺术感染力、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以及“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sup>①</sup>共存的传播特点,作家们在作品中揭示的社会现实方可引起专业读者与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让他们走出“茶杯里的风暴”,纷纷投入到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建设中去,在庞杂的公共舆论中建构起民主、透明、自由的话语空间。当然,要让文学经由传播通道收获公共性,从本源上来看,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他们在探讨重大现实问题时均要彰显理性精神、责任意识和独立思考。如果缺乏这些要素,那么仅仅通过公众讨论的热闹与否来作为衡量文学公共性的标尺显然是狭隘的。要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引领下,当代中国文学纷纷搭上通往世界的列车,开始了跨域“旅行”的征程。在“旅行”过程中,有一批在本民族文化场域中公共性匮乏的作品却在异域煊赫一时,赢得了无与伦比的文学公共性,当然,那些自身即内含公共性能量的作品也经由文学输出而强化了其本来的公共性。关于此番“旅行”出海中再生的激情的公共性景观和新的公共空间,有学者从“看”与“被看”的视域出发,认为这是一种肆无忌惮地“想象中国”甚至是“无中生

有”的建构。<sup>②</sup>事实上,在异国他乡,文学公共性的积累包括以下几种方式:首先,作家们都聚焦本民族土壤上发生的重大社会现实,这些现实往往带有公共性和新闻化色彩。而后,当这些打着“中国性”旗号的作品被译者根据不同的接受生态和接受群体有选择地译介到世界各国,并经过了“他国化”的变异处理后,引起了他者的广泛关注。域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媒介、评论家与公众纷纷赞赏此类作品在时代性、干预性甚至政治性等维度的果敢和魄力,给作品贴上公共性的标签。其次,这些作品在域外传播时也屡获大奖,而由于中国作家对国际奖项的“仰望”情结,重大奖项伴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也迅速演变成公共事件,在新时代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立体化传播场域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不过,正是在波澜中,越来越多的世界性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开始青睐中国小说,并加入对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来。如此,文学活动中的不同主体跨越民族、地域、语言、国家的疆界,积聚起公共话语,打造了多元化的文学公共空间。正是在此维度上,文学的译介传播和“旅行”获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积聚公共性的重要途径。

### 三、真假与强弱之辨：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跨国旅行与文学公共性图景的别裁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一路高歌的“世界之旅”是否存在传播幻象?我们作家的声音是否已经借助文学传播转化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的声音”<sup>③</sup>?那些聚焦中国现实、书写中国经验并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开花结果的作品,其收获的文学公共性能量究竟来自对文学自身的认同,还是源于恰好契合了西方对当代中国现实想象的心理预期?毕

① 陈力丹:《文学、艺术传播的各自特征》,《东南传播》2016年第8期。

② 赵勇:《文学公共性的跨国旅行?》,《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③ 刘毅青、张欣:《20世纪中国文学里情感的公共性维度——以海外汉学的研究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竟,异域他乡催生的公共性脱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是一种被翻译过滤、市场筛选、意识形态目光打量后的“二手公共性”。我们有必要结合文本内容、作家立场、译者行为、域外接受等维度来判断其真伪,识别投机性传播。

新世纪介入当代现实的小说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异军突起,收获文学公共性,首先和题材的民族性、当代性、现实性休戚相关。在小说中,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聚焦转型时代风云际会的中国现实,而这些现实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呈现的是温热的当代中国经验。同时,此番明确展示当下中国风景的作品大多与民族公务或公共话语密切相关,它也激起了域外读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探索欲望,在众说纷纭中有助于文学公共性的获得。除了题材上的时代性,这些小说往往还因为讲述中国故事时极具先锋气质的方式而在异域大受欢迎。应该说,“走出去”的中国作家几乎都经历过从西方文学思潮中“学步”和“吸氧”的过程。告别“学步”期,当作家们将眼光聚焦本土现实时,他们更注重坚守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原创性”。所以,新世纪以来,诸多作家不再对西方文学技巧趋之若鹜或搬弄移植,而是回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富矿中,在呈现鲜活热辣的中国社会现实时也力求打造中国符号的创意美学。不过,要走向世界,作家们无法屏蔽世界视域。为此,他们孜孜于探索“民族性色彩+国际化表达”的融合路径,在东西方文学技巧的改造、打通和糅杂中成就“混合的产物”。这种中国气质、时代精神、世界视野兼具的“混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域外“旅行”的“秘笈”,它不仅为持守文学个性、增强文学传播、促进文学接受、达成价值共识开辟了新道路,还在对外输出中实现了文学公共性的有效增殖。

相比其他文学作品,新世纪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的小说在“翻山越海”的传播进程中虽然态势喜人,但也引发了浩波巨澜。国内学界的不少研究者将这些作品的“出圈”归因于作家对西方价值的逢迎。固然,这番“恶声”可以拓宽文学批评的维度,但客观上也给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施加了阻力。其实,无论是审视一众作家的写作立场、聚焦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文本特

质,还是索解创作者对当代社会世相的真实认知,我们都不能不加辨析地对此类文学在异国他乡建构的文学公共性嗤之以鼻,更不能断然阻遏文学传播的通道。毕竟,艺术无国界,真正的文学亦没有东西之分,而传播则给文学提供了与“他者”进行平等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之所以不能干扰对外输出的进程,原因还在于我们要经由文学传播的路径来矫正、补充西方读者眼里的当代中国形象。今天,即使我们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理念,也不能否认部分西方读者仍从东西方的异质性力量出发,以西方立场为中心或带着政治滤镜来误读甚至扭曲中国形象。所以,我们将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现实主义小说传播出去,一方面是将中国精神带向国际文坛,另一方面也对西方读者眼中“古老”的中国形象进行纠偏,由此建构文明互鉴的文化观。

虽然我们强调不能在域外捧得文学大奖和收获巨大文学公共性的文学肆意攻讦,但无法回避的是,在当前较为活跃的创作圈层中,部分作家确实呈现出了显豁的西方读者本位倾向。在这些作家笔下,创作出来的内容看似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一往情深”,实则削足适履,沦为“无根”的浮萍。

之所以如此论断,首先是因为此类作家虽表面上聚焦转型时代独具视点的公共事务和现实问题,但是,从文学创作的内核来看,他们往往打着“国际化”旗号,对中国本土大地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根基置若罔闻,转而依附西方中心主义,套用其话语范式、文化价值观以及审美传统来强制阐释当代中国盘结错落的社会现实。其结果就是,作品既无法对本土重大现实事件进行客观化和“中国化”的剖析,亦无力激活民族个体记忆和公共记忆,最后只能成为一种徒有“现实”皮囊包裹的文学,缺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基因。其次,在这部分域外“旅行”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还有一些作品在剑指错综复杂的当下社会现实时,一头扎进“暴露”的泥淖里大做文章,其“暴露”还未必客观,而是存在刻意渲染阴暗面、堆积负面事件、通篇怨气弥漫的痼疾。同时,在暴露之下,作家们却不从本国的历史渊源、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等层面来解锁

病源。此番对现实“做减法”的写作常会呈现偏激的一面,展示出来的中国形象具有臆造特征,悖离了社会现实的本质真实。

对于这两种文学,如果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来看,外在言辞上都彰显了他们对现实的深切谛视。但是,从文本内部出发,作家们实则呈现出隔岸观火或不痛不痒的姿态。他们在指陈现实时缺乏了对社会问题的条分缕析,也没有楔入民族精神图谱的纵深处一探究竟,甚至演变成新闻串串烧或公共事件的机械堆砌。其小说标榜的鲜明立场只是外强中干的文字表演,取用的话语资源也未经深思熟虑。当然,峻急的批判也许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现实的刻板期待和偏执想象,满足了他们的文化猎奇与批判心理,但是,闭门造车、飞离大地母体的现实书写自然违背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类小说以及它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传播显然造成了极大的损毁。究其本质,不管是浅薄暴露中国现实还是肆意臆造中国现实,都成为投机主义或迎合资本市场的消费型文学。特别是仅仅停留于暴露维度的文学,作家们在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下展开“揭丑”“抹黑”“审丑”行动,以一种“扮猴心态”或“粗鄙修辞”般的“变形记”<sup>①</sup>来进行海外营销。无疑,这些小说在“内修”维度并没有昭示出真正关切现实的精神或宽广深厚的人性关怀,更没有凸显出“建设性”的文学力量,文学公共性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此类小说的“出海”征程却畅通无阻,国外媒介以及部分批评家、汉学家们对其大加赞赏,呈现出明显的“外冷内热”接受图景。在域外媒介集体性的“着迷”的宣传和追捧中,这种小说的公共性迅速膨胀。不过,此番“他国化”的“变异性”<sup>②</sup>的公共性需要甄别。毕竟,它不是文本内部生发的公共性,而是西方媒介联合资本、政治以及其他势力强制打造的产物。换句话说,这些小说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开枝散叶、轰动一时,收获文学公共性,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凭借其情感的真挚、形象的生动等文学性色彩征服西方读者,而是与新闻性、政治噱头乃至“观光”价值挂钩,取决于能否迎合“观光者”们的猎奇心理、窥视欲望或丑化癖好等种种“偏狭趣味”<sup>③</sup>。

之所以发出这番论断,是因为从当前文学传播与接受环境出发,仍有不少西方读者站在文化异质性、意识形态差异性以及话语霸权的角度来看衰中国,甚至“黑化”中国。这种“傲慢与偏见”的心理是导致百年中国文学“输入”和“输出”产生极大逆差的根源之一。在“中国声音”日益嘹亮的今天,“斜眼看中国”的评判标尺和执着的误解依旧存在。

遗憾的是,一些中国作家对此番畸形的文学标准了然于心,却仍然趋之若鹜,在心灵“迷失”中做出了与之“合谋”的举动。他们有意地挑选世界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现实话题,甚至故意暴露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阴影角落和愚蛮景观来触发异域媒介及读者的“震惊”效应,但是,在极尽铺陈的暴露和嘲弄挖苦式的叙述中没有对社会问题追根溯源,也脱离了本土大地的历史基石和传统文化,更缺乏悲天悯人的胸怀。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作家要遮掩民族公共生活中的黑暗或邪恶,相反,对于现实中的浊流和暗流,作家要以不避斧钺的勇毅和醒世独立的姿态介入其中。但是,在揭露的同时不能忽略当下现实景观的斑驳,正所谓,“现实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作家不能只反映“半面现实”,<sup>④</sup>至于现实中黑暗的那一面,除了暴露,其重点更在于反思和改良,要能“于最黑暗的方面反映出世相的壮丽”<sup>⑤</sup>。茅盾、朱光潜等前辈的警示话语对于新世纪书写现实的作家们来说并不过时。如果作家们摒弃这一写作规则,打造出病态的猎奇、审丑或揭私性文学,不仅悖离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也与真正的公共性力量相距甚远。它只是一种思想上好逸恶劳甚至曲意逢迎的写作,作家们在聚焦现实生活时并未抱持着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性理想,也没有从

① 傅小平:《翻译“文学”,还是翻译“中国”?》,《文学报》2017年8月10日。

② 姜智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下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小说评论》2024年第5期。

③ 季进、姜智芹编:《麦家作品的世界之旅》,第213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21。

④ 茅盾:《如何击退颓风?》,《茅盾散文集:白杨礼赞》,第289、29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⑤ 朱光潜:《谈文学》,第38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2。

公众利益的立场出发激浊扬清,更没有对当代中国民族公共事务进行抽丝剥茧般理性剖析。一旦放逐了内在的精神风骨,作家们自然无法成为社会公众精神世界的引领者。故而,从文学维度来看,这类小说在对外输出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性力量不啻为空穴来风。换句话说,此番公共性是由重大新闻事件或争议性话题引发的轰动效应来强制性建构的,表面上众声喧哗的讨论盛况也并非读者自主形成了理性的话语空间,而是部分另有图谋的新闻媒介或政治力量借助舆论来单向度地引导读者,将社会接受的思想强行灌输给个人接受。公众虽然在“众声”的蛊惑下加入讨论的大本营,但是此番屏蔽异音、消弭差异的公共性显然构筑了一道伪公共性风景。它既不能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自由地思考,亦无法捍卫文学的独立性精神。更遗憾的是,这类小说在异域他乡的热烈争论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读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误读和偏见,这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显然造成了阻遏。

#### 四、“在民族中”与“到世界去”： 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跨越山海与 公共性建构的路径

无论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来进行创作,还是以“世界视野”为中心来译介推广,最终都必须走上文学传播这条路径,尤其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文学共同体”的文艺旨归下,我们更要倾听来自世界的“回音”,持续优化对外传播的渠道,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当然,在动态性、跨时空的海外传播中,文学传播途径、传播成效等与政治观念、译介模式、媒介技术、经济环境、文化差异、出版机构等因素息息相关。但是,回归文学传播的本质,“打铁还需自身硬”,即我们本土文学的创作才是“正途”所在。针对本文所讨论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说,我们孜孜索解的问题是,置身于“世界”疆域中,在他者之镜的折射下,文学如何重构与当下现实的关系,怎样凭借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等中国元素的增值意义来更有效地书写中国故事,何以在文学纪律与公共生活的张力中建

构独特、真实、立体的当代中国形象,并于海外“闯荡”的旅途中筑好“防火墙”,获得真正且丰盈的文学公共性?

对作家们而言,在介入现实公共事务、勘探现实迷津、建构中国形象时,要想实现跨文化突围,无论艺术“法器”是“单刀直入”还是“曲径通幽”,抑或“飞翔”与“接地”,他们都不能抛开毛茸茸的中国现实,毕竟,“中国性”无异于作家创作的导航磁铁。当然,作家们对铺天盖地的现实信息流要进行大浪淘沙般地提纯,既以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姿态热烈拥抱庞杂而又略显“坚硬”的现实群,更应在水落石出中选取最能彰显中国气质、时代精神和当代中国演进轨迹的公共事件及现实画面来进行个性化解剖,即便这些现实蒙上了尘垢、隐现着暗殇、渗透出淤血,也不能蜷缩起来一笔略过。毕竟,它们身上都镌刻着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印痕,诉说着现代化进程中活色生香的中国经验,而这些元素正是新世纪作家践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时的血肉与根系。透过这些斑驳刻骨的风景,我们才能深入生活现场或走到时光的景深处,勘探现实的核心岩层,解析当代中国社会动态演进的内在机制和深层规律,在文学的矿脉中提炼出生活的本质、挖掘出中华文明的钙质,并于艺术变形中展示一个血肉丰满、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反之,若作家们对中国经验的书写漂浮于现实土壤之上或悬置了历史根基,陷入一种凌空蹈虚或主观臆造的写作,那么,此类叙事建构的中国形象将面临悬浮失重的嫌疑。即使作家们经由短兵相接式的暴露法或扬眉仗剑式“重口味”的艺术手段在文学公共领域获得广泛影响,其价值仍应受到质疑。同样,作家们在书写转型时代烟波浩荡的社会现实时也需要展开时代褶皱,直面隐蔽场域中那些承载着社会伤疤的图景,只有敞开心襟,“向着火跑”,正视历史演变进程中的痛点与堵点,洞察各种社会问题之间幽微的联系,方可开辟出超越困局的通途。这种底气十足的文学的传播既能让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出圈”,也传递着当代中国的“大国心态”。

回顾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出海”之旅,不难发现,虽然作品里中国现实的“在地性”“故

事性”或“当代性”无异于文学传播的底气所在，但这并非意味着否定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排斥“世界性”视野，相反，这种本土立场的坚守正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实践基础。不过，置身于国际“风景”的经纬网络以及“现场直播”式的文学场域中，如何将原汁原味的中国叙事与彰显民族特质的文化形象有效传播至国际舞台，从而为世界所凝望？在我们看来，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植根于中国城乡土壤或依赖于个人的“生活半径”，但在呈现社会转型期藤蔓交错的现实图景时，可以突破杯水微澜的狭小格局，从中国现实中发掘能冲出国界、穿透文化隔阂的世界性公共议题，比如生态危机、公共卫生安全、人工智能与伦理问题、地缘政治与地区冲突等，在焦点性话题中寻找共同语言与共通情感。除了在现实维度给跨域传播增加砝码，作家们还可将笔触延伸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维度，挖掘与梳理出能打破语言和文化隔阂、具有通约性价值的话语资源，诸如人性本质的探寻，宿命与自由的辩证，对历史纵深感的反思，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生命与死亡的终极叩问，爱与憎恨的情感张力、冲突与矛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对话等属于全人类的话题。应该说，在与世界现实的耦合中彰显人类世界共同的情感底色，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才能冲破语言屏障，唤起人们普遍的情感共鸣，获得“世界性的通感”<sup>①</sup>。不仅如此，这种艺术创作也更容易以其独特的跨域魅力突围文化藩篱，削弱异国文化带来的偏见，让世界减少对中国的误解，从而越过文明的疆界，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中绽放异彩。最终，通过作家建构起的能引发“自我”与“他者”精神共振与文明共鸣的跨文化叙事，人们经由文学想象和情感体悟会形成积极的“文学性对话”和“生成性对话”，在反思性认同中培育世界的“中国情怀”，于平等参与和理性交流下建构具有真正公共意义的文学话语空间，打造富有活力的文化公共图景。

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不仅要在内容维度凸显“中国性”特质和“世界性”视野，更需破译艺术表达的新型密钥，发掘通过哪番文学技巧来呈现当代中国才能让驳杂花哨的社会现实转化为更具审美性、形象性和思想性的文

学现实，以此推动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出海”之旅，助力中国形象的全球传播与接受。就叙事方式来看，作家们要拒绝现实书写的“大路货”，汲汲探索现实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交融的技术路径，完成从“传统艺术”到“创新融合”的方法调适。这种融合似乎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彼时，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在扑面而来的浪头和“影响的焦虑”下，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发动了一场爆炸式的艺术“地震”。在这一时期，众多作家积极“拿来”西方先锋文学创作手法，并试图作用于中国本土社会现实，打造出一批具有实验性质的文学作品。不过，从效果来看，在那个标新立异的年代，社会现实往往沦为拆解世界的背景容器或作家们进行技术操刀的试验场，其呈现是虚浮甚至苍白的。部分文学投机者沉醉于迷宫圈套般的技术武艺、时髦抽象的哲学观念、层出不穷的超验主义。只是，缺乏内心体验或坚实的现实根基，单一的形式革命终将偃旗息鼓。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们走出“游戏”的途穷日暮，也摆脱了西方“滤镜”，开始基于创作主体性、社会文化语境与审美范式嬗变的多维视角来进行自我纠偏，比如重新架构理念与形式、故事精神与艺术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当作家们将艺术视角再度聚焦本土文化根系与现实大地时，他们逐渐意识到文本形式创新与内容价值表达实则构成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艺术自觉促使作家们在形式探索与现实关怀之间寻求平衡。他们力求将新潮技法与转型时代的现实问题深度融合，以呈现时代的波光云影。从创作技艺自身来看，作家们在经历了模仿、借鉴的世界性技术接轨后，亟须反思与突破，实现艺术创作的自我革新与范式重构。他们应当回归东方文明的沃土，向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层矿脉掘进。通过汲取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和对民族文化的激活及创造性转化，再度寻找“中国式”的文学创作路径。这番寻找既是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世界文学版图的有益补充。比如，就那些

<sup>①</sup> 郑周明：《叶炜：以“世界性的通感”，进入中国的现实与传统》，《文学报》2020年1月9日。

在民间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沐浴成长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往往能够与传统“深情相拥”,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智慧体系、神秘主义思维模式以及别具一格的信仰格局中汲取养分,重构对时空、生死及真实等哲学命题的认知。由此,这种深层次的“人—地”精神联结不仅为他们开辟了观照现实的新视角,也为其探索时代书写提供了创新性的方法论支撑。另外,作家们虽然聚焦的是热气腾腾的现实经验,但在笔法上同样可以回归传统的异邦或民间文化的深井处,对旧有的技巧赋以现代化的“易容”,在转码或生发中让“旧瓶”不仅能装新酒,还能换“新装”,从而铸就新型的东方化艺术笔法。可以说,由羡慕“外国的月亮”到回眸“民族的风景”,这种“往回走”的姿态和无法拒绝的本土气息不仅昭示了作家们历史观、文化观和世界观的重构,更彰显了他们采取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块茎般缠绕的中国现实。正所谓,“一个优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现实,也要与传统或历史建立对话关系”<sup>①</sup>。除了发思古之幽情,置身这个“全球在地化”的时刻,我们的作家在对过去取经学道时也要突破“茧房”、与时俱进,即不仅回归传统,而且着眼未来,尝试用技术赋能为现实书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路径,打造科技、现实与传统三翼齐飞的文本,致力于赛博空间和在地空间的融合。当然,要让棘手的中国现实与古老的文化根脉以及现代的科技新声发生耦合效应,作家们往往需要在文本中应用新兴技术媒介,由此打造出沉浸式、交互性的小说。这样不仅让世界读者们获得“在场感”,还在嘤鸣激荡中打造出新时代读者与作者的文化共同体。只是,面对新的写作介质和技术,以情感人、以想象力立命的文学永远要保留警觉之心。近年来,诸多追赶“速度”的年轻作家太过热衷于省事的“云观察”或者简单工具化,难免会出现创作的失真,呈现出被云雾遮蔽的中国形象。由此,返回故土或追求新潮并不意味着拒绝世界

或完全陷入东方主义凝视,只有保持中与西、“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双向道互动,才能继续开榛辟莽,搭上“扬帆出海”的大船。在跨越山海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希望这些自身介入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性精神的文本能够在文学的度量衡上得到世界性的尊重,并经由异质解读、舆论交锋或广泛共鸣建构巨大的文学公共性。这才是真正充满生机的现实主义文学,它历史悠久却永不落幕,一直在探索的路上。

可以说,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在“到世界去”的路途中仍需不断地“吸氧”,以生成新的活力。从创作出发,面对风驰电掣般的数字化时代,文艺“尖兵”们也正在努力探索讲述中国故事的新道路。他们力争做一条深海潜行的“大鱼”,全身心地沉入现实海域,在时代巨浪的翻滚中感受并书写当代中国的蝉蜕、疼痛及变革,让文学与现实大地、文学与公共生活进行深度对话。当然,要想让文学在域外“旅行”中产生积极的“落地效应”,我们需要寻找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在诗性正义的公共性景观中为跨域建构积极的“现实中国”和理性的“文学中国”形象提供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先锋叙事’研究”(22FZWB090)、2025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银银,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sup>①</sup> 芦苇岸:《现实触须的敏感与内在锋芒的敏锐》,《青海湖》2018年第10期。